

巴中石窟

内容总录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巴州区文物管理所



K879.29

20083

巴中石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总录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巴州区文物管理所

1. 《总录》先从造用数量最多的南龛开始，然后是城东方向、城南方向、城西方向。因碑文是一页数金像的概括太困难，故用2-3张或多张照片，《总录》中去除了造像年代、造像等级、保存状况、后代维修情况或雕刻的主要造像，金壁浅浮雕者较少，少数愈因风化或者被盗像（如金牛系壁等）。

2. 《总录》描述中之“半空塔柱”表示一字磨灭不清，“（缺）”表示缺损一个字，“……”表示不清楚有多少字。

3. 在“窟形”描述中，除主尊外，一般按主尊、胁侍、护法（天王）、左壁（后壁）、右壁顺序描述。主尊指造像之规模，因而其位置在前，而胁侍、护法（天王）则在后，左壁（后壁）、右壁顺序描述。

4. 《总录》原则上在原文管所的报告中，川陕两部分民国金像和经现代改造之文像，均不作描述，但有的愈风化严重，但造像的痕迹甚多，且有金像之规模，因而也作简要描述。

5. 窟内造像一般均有内、外龛，故有内外龛之说，个别龛因距离地面过高，无法进入，故无内外龛之说。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巴州区文物管理所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10 (2008.3 重印)

ISBN 978-7-80659-915-0

I . 巴... II . ①成... ②北... ③巴... III . ①石窟 -
巴中市 - 目录 IV . K879.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643 号

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BAZHONGSHIKUNEIRONGZONGLU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巴州区文物管理所

策 划 段志洪

责任编辑 陈 红

执 笔 雷玉华 程崇勋

图片拍摄 李绪成 李 升

装帧设计 经典记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巴蜀书社

电 话 发行部(028)86259422 (028)86259423

总编室(028)86259397

编辑部(028)86259436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制 版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 × 285mm

印 张 32.625

字 数 62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9-915-0

定 价 128.00 元

著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87487333



说
明

《陝西石窟總錄》 說 明

1. 《总录》先从城周数量最多的南龛开始，依次是城周的北西东龛，然后是城东方向、城南方向、城西方向由近及远记录。原则上一龛一照，图随文走，少数龛像因拍摄太困难而缺照片，有的龛特别复杂，因而用2-3张或多张照片。《总录》中每龛龛名下含位置、时代、龛形、造像内容、造像尊数、保存状况、后代遗迹等项，其中造像尊数是指龛中高浮雕或圆雕的主要造像，龛壁浅浮雕之像如天龙八部、飞天、供养人等不计。少数龛因风化或并非造像龛（如龛中系塔或碑铭等）而缺某些项。

2. 《总录》描述中之“左右”均指龛中主尊之左右。铭文中“□”表示一字磨灭不清，“（）”表示前面“□”中磨灭的字可能是“（）”中的字，“……”表示不清楚有多少字磨灭不清了。

3. 在“龛形”描述中按先外后内、先上后下的顺序，“造像内容”中一般按主尊、胁侍、护法、供养人的顺序。少数造像复杂的龛按正壁（后壁）、左壁、右壁顺序描述。每尊像则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描述。

4. 《总录》原则上在原文稿所编号的基础上不作删节，有号即录。其中涉及部分民国龛像和经现代改造装彩之像，记录时从简。

5. 有的龛风化严重，但龛中像的痕迹仍然清楚，仍可大致测出原像尺寸，反映原龛像之规模，因而也将尺寸录下。

6. 每龛一般均有内、外龛长、宽、高的尺寸。每尊像有高、肩宽、座高的尺寸，个别龛因距离地面太高，无法测量，因而缺尺寸。有的龛因残损而尺寸不全。

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 巴蜀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巴州区文物管理所编

地城·巴蜀书社·2006.10(2006.3 初印)

ISBN 978-7-85599-015-0

上册·第1卷·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

《四川石窟内容总录系列》

编委会

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BAZHONG SHIKUN NEIRONG ZONGLU

主任 徐荣旋

副主任 王琼 孙华 赵川荣

王毅 高大伦 霍巍

委员 朱小南 李崇峰 段志洪

罗宗勇 杨希明 付成金

雷玉华 王剑平



代前言

目
录
内
容
总
提

四川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①

——代前言

罗 炯

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灌溉便利，适于农桑耕织，是农业社会的“天府之国”。早在秦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其地最著名的产品——蜀锦，招致朝廷在成都设置锦官，负责督造和征调、采购，是故成都又名“锦官城”。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成都是起点之一。在汉朝时期，已经有不少胡商来到四川。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造像，有很多出自四川，应该与这些入蜀的胡商关系密切。吴焯、宿白先生均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各自做出了独到的论述。^②

四川最早的佛教石窟出现在川北广元的交通要道上。其地扼四川——汉中——长安以及四川——河西走廊——西域两条主要通道的咽喉，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均为要害之地。北魏时期，受北方佛教信仰和开凿石窟寺的影响，广元开始凿窟造像。唐高宗至武周时期，由于武则天出生于广元，此地的开窟活动出现高潮。广元以东的巴中，也在这时大量开窟造像。成都周围的一些地区，在武周时期开始出现佛教石窟。这是四川石窟的初期兴盛阶段。

到盛唐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崇尚道教，对佛教不似武则天那样热衷，因而除了敦煌之外，北方开窟造像的势头有所衰减。安史

^① 遵照数十年来学术界和美术界的习惯称谓，本文所说的四川石窟，包括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两个行政区的石窟。

^② 吴焯：《四川早期佛教文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考察》，载《文物》1992年第11期；宿白：《四川省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教札记》，载《文物》2004年第10期。

之乱以后，中原残破，华北地区凿建石窟寺的活动几近绝迹。然而，在四川，从盛唐至南宋的五百多年中，各州各县纷纷开窟造像，西川、东川遍地开花。这一时期的中国石窟，只有敦煌可以与四川媲美，而四川石窟的数量不仅超出敦煌数十倍以上，大足的南宋石窟更成为中国晚期石窟最杰出的代表，绽放出敦煌也没有的奇葩，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国内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雕塑的代表作——收租院，其艺术源头便来自大足。

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之后，唐僖宗逃奔成都。自此以后，直到宋朝建立的八十年间，成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其文学、艺术创作和工艺均达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对于宋朝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大慈寺为发源地，成都的佛教文化与学术创造出新的题材和形式，如《十王经》等，传遍全国，并且传播到朝韩、日本、越南。在敦煌石窟晚唐、五代时期的壁画和藏经洞的文献中，有不少从成都传来的 new 样式、新品种。为什么敦煌会有这么多直接来自成都的东西？这大概是由于晚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长安、洛阳两京衰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改经成都，因而成都与敦煌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关于公元九世纪后期至十世纪中期成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成都与敦煌、成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学者们虽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作出过有价值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缺乏总体的观察和全面的揭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四川石窟中，保存着丰富的、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对于认识成都和四川在九至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认识成都与敦煌及丝绸之路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近两千年来，道教在四川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面对佛教徒大规模开窟造像的举动，四川道教徒也不甘寂寞。中国最早的道教龛像便出现在四川，中国数量最多的道教石窟保存在四川。仁寿县千佛寨的道教石窟题记中保存有关于道教经典最早而且完整的记录，不仅比最权威的《开元道藏》还要早，而且与《开元道藏》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异。这一记录在二十世纪末期曾经引起国际道教学界的极大关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四川道教石窟的调查与研究尚处于初步的阶段，我们的研究水平大大低于国外学者。

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地方政权，与唐朝存在着长期的密切



交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唐朝的衰落与灭亡均与南诏关系极大。南诏的主体文化和宗教都是从唐朝汲取的，尤其是与四川成都、与成都大慈寺渊源最深。然而，由于十世纪以后四川和云南多次发生战乱，记载南诏与成都之间文化联系的原始文献大多毁坏失散。可贵的是，在四川石窟中，还保存有不少显现南诏文化和宗教源头的实物图像资料。

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同需要，中国的佛教徒又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活动形式，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两项，一是禅宗，二是水陆道场。关于禅宗，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对于水陆道场，学者们的研究相对薄弱。四川佛教徒对水陆道场的创立和发展贡献最大，因而只有在四川石窟中反映出水陆道场的巨大影响，有些石窟甚至完全是按照水陆道场的仪轨开凿的。这在中国和全世界的佛教石窟中，都是独具特色的。

四川石窟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和特别的历史地位，笔者仅仅考察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以上认识尚属皮相之见。近六十年来，学术界、美术界对四川石窟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与美术家相比，学者们做的工作还是零散的、比较表面的，深入的、基础性的工作做得不够。幸赖王毅、孙华两位同志远见卓识，于2001年倡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并且亲赴现场指导，首先对四川早期的广元、巴中两处石窟进行科学调查。现在出版的《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和即将出版的《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就是这次合作取得的成果。这两部总录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详细、全面地记录了巴中、广元石窟的基本情况，保存了基础资料，成为四川石窟研究的一个比较规范的开端。在工作中，培养了专业人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我特别感佩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雷玉华同志，一个弱女子，经年累月地在大山、石窟中攀爬，在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中开拓，在金钱物质的喧嚣中埋首学术。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如此敬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四川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寺大省

——序《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徐荣旋

四川是文物大省，这不但是就文物数量而言，还因为我们集中了大量的高级别的各类文物保护单位。即将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一书中，仅收录的野外文物点就达一万五千余处，其数量在全国省级文物地图集中名列前茅。在这一万五千余处野外文物点中就有一千多处是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其比例接近十分之一。在四川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中，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其中乐山大佛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安岳石刻极有可能成为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足石刻的合并项目。在一省之内有如此众多的高品级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全国绝无仅有。从我国著名的石窟寺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所著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石窟寺分布图》一书中，可以看出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的石窟寺也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四川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寺大省。

四川摩崖石刻艺术发端于汉代。在乐山的汉代崖墓中，有我国最早的佛像雕刻。我省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开凿于南北朝时期，从那时起至民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连续不断地开凿了一千五百多年，其中要数唐代中期至宋代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最为辉煌，因为这是在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结束以后唯一大规模集中开窟造像的区域，并将中国集中大规模开凿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时代向后延续了五百年，这在中国石窟寺开凿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安岳——大足川密造像不仅反映了佛教密宗在四川的兴旺发达，更重要的是那无与伦比的想象和创造，使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远远超越了宗教偶像的范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形象和内容的中国化、世俗化，表明了佛教这一外来宗教至此已全部被中国文化融合，完成了其东



序

方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祖先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丰富的石窟和摩崖造像让我们拥有崇高的荣誉，也让我们承载了不可推卸的使命。作为四川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我们肩负重任，不敢稍有懈怠。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全省石窟寺和摩崖石刻造像作为文物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即组织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全省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辛工作，七十年代末，我们对这类文物点的时代、分布、数量、保存状况等终于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初步的保护及研究计划，记得当时还确定了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为重点保护和研究的试点单位。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它们能顺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我们文物工作者几十年来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

分布在我省深山峭壁之上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地点分散，数量众多，有的体量巨大，实施调查、测绘和保护等工作都极不容易。因此，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保护和研究是一项长期又艰巨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多学科综合配套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奉献。

近年来，文物事业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不负众望，争取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高兴地看到，几十年文物工作的实践，一批有志于从事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保护与研究的学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肩负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重任，知难而进，勇挑重担，终于有了今天的收获，实在可喜可贺。在《四川石窟内容总录系列》丛书出版之际，谨以此为序，并铭记他们的贡献。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

目
录

四川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目 录 CONTENTS

四川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代前言 / 罗炤 / 1

四川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寺大省

——序《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 徐荣旋 / 14

巴中石窟概述 / 1

一 巴中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2

二 巴中石窟的分布 / 4

三 造像特征与开凿时代 / 8

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 11

一 南龛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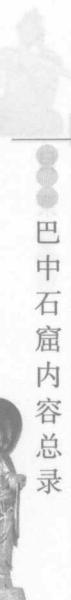
二 北龛 / 214

三 西龛 / 246

四 东龛 / 333

注：巴中石窟指巴中市所辖的南充、广元、达州三个地级市的石窟，不包括巴中市所辖的两个行政区的石窟。

②吴焯：《四川早期佛教文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考略》，载《文物》1992年第11期；宿白：《四川省战国和汉代部分墓葬的佛教——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教礼器》，载《文物》200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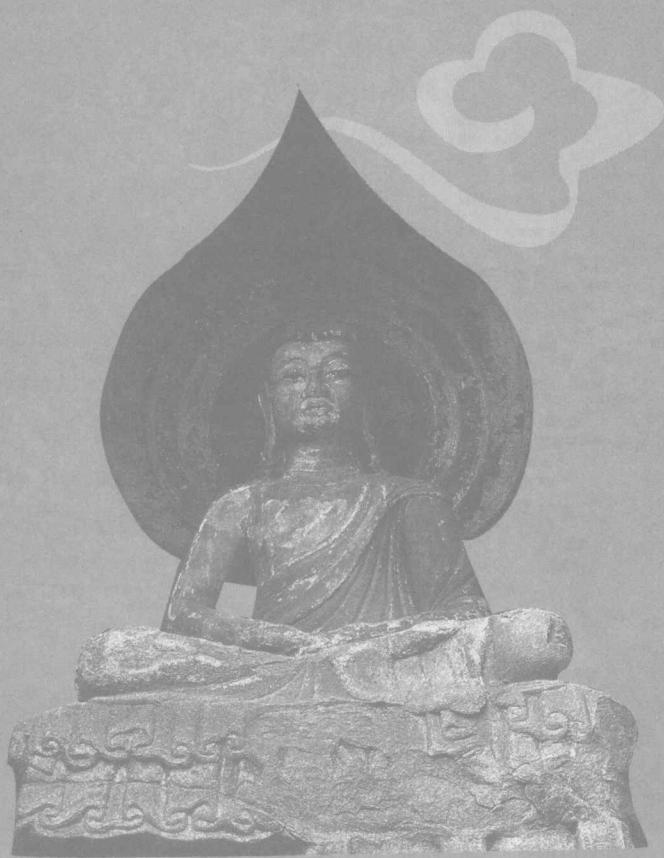
《四川石窟内容总录系列》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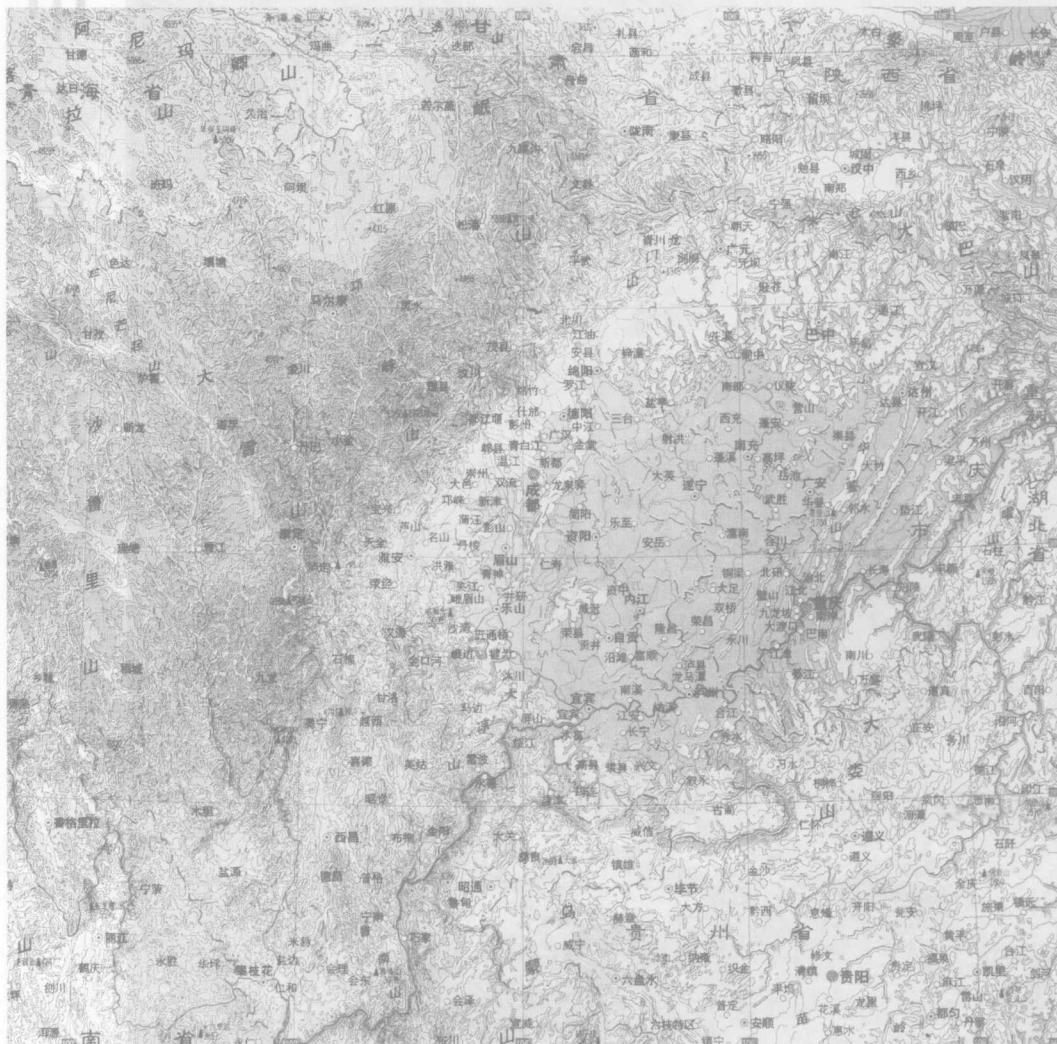
CONTENTS

主 编	徐荣旋	副主编	王 琛 孙 华	顾问	赵川来
五 石门寺	/339	王 琛 孙 华	赵川来		
六 兴文沙溪	/365	高大伦			
七 甘泉佛尔崖	/383				
八 甘泉佛框湾	/391	朱小南 李崇峰			
九 曾口佛洞湾	/399				
十 水宁寺	/403	罗东明 杨培明			
十一 三江龙门山	/444	王剑平			
十二 三江佛爷湾	/459				
十三 恩阳千佛崖	/460				
十四 恩阳佛尔崖	/466				
十五 麻石佛尔崖	/473				
十六 来龙佛爷湾	/477				
十七 三汇奥基寺	/484				
十八 玉井佛尔崖	/491				
后 记 /雷玉华	/497				
新世纪四川石窟考古的缘起及进展					
——代总后记 /孙 华 /498					

巴中石窟概述



一 巴中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图一四川地形图

巴中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北与陕西省相邻。秦至三国时期属于巴郡宕渠县。南北朝齐时属归化郡，北魏延昌三年（514）始置巴州，属巴州大谷郡，入南梁后仍属巴州大谷郡，北周时属巴州归化郡。隋大业三年（607）改为清化郡。唐代武德元年（618）改为巴州，领化城、清化、曾口、盘道、永穆、归仁、始宁、奇章、安固、伏虞、恩阳、白石、符阳、长池十四县。其年，以符阳、长池、白石属集州，以安固、伏虞属蓬州，清化属静州。二年（619），割归仁、永穆置万州。贞观元年（627），废万州，以归仁来属。同时全国因“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其中第五道为山南道，第九道为剑南道，以成都为中心的今之川西地区属剑南道，巴中属山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原来的山南道分为了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巴中和今四川的通江、广元、阆中、南充以及重庆市等均属山南西道，治所在梁州（784升为兴元府，今之汉中）。天宝元年（742）改为清化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巴州。五代时归蜀，宋时仍称巴州清化郡，属利州东路。明初降州为县，至明正德年间复为巴州，归保宁府。民国二年（1913）改为巴中县，1993年改县为市。^①（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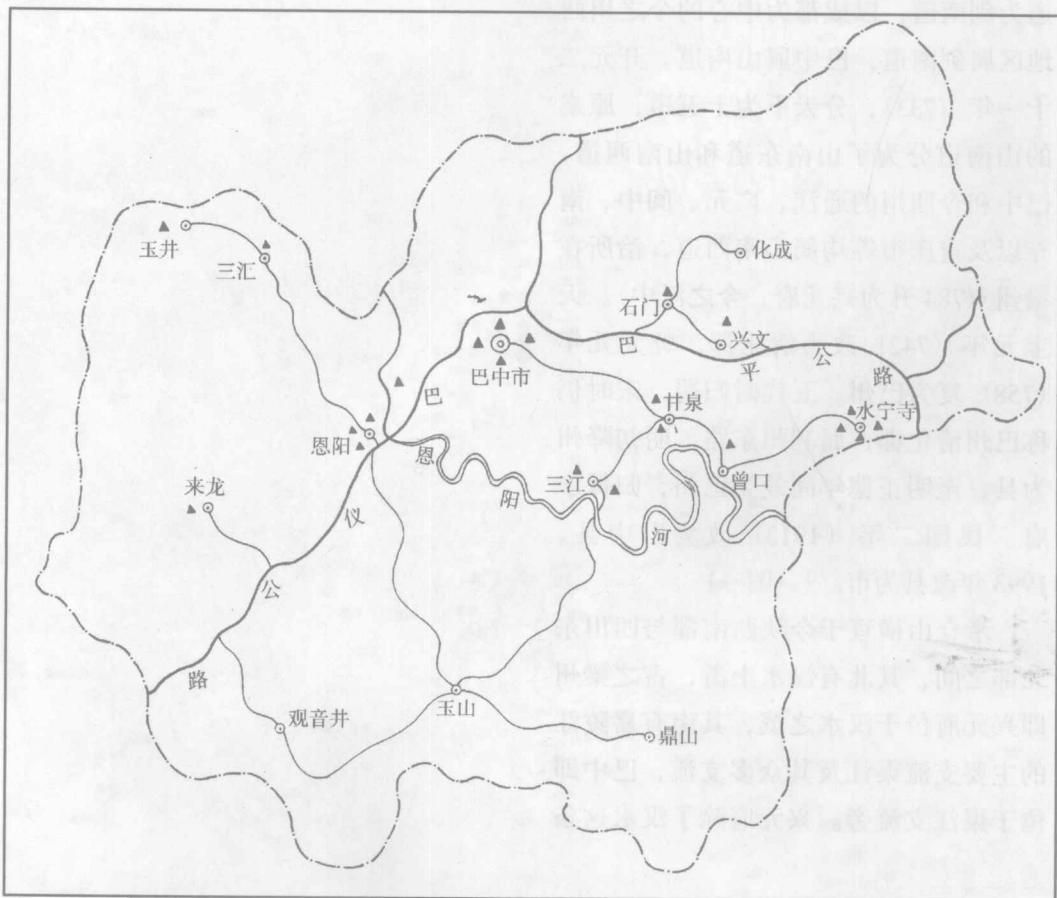
米仓山横亘于今陕西南部与四川东北部之间，其北有汉水上游，古之梁州即兴元府位于汉水之滨，其南有嘉陵江的主要支流渠江及其众多支流，巴中即位于渠江支流旁。兴元府除了汉水这条

通道外，北面又有骆谷、斜谷等道路与京城相连，交通位置极其重要，古代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即因翻越兴元之南的米仓山而得名。巴中市位于米仓山南麓巴河之滨，是米仓道南段的重要通道，巴中也因此道与兴元府相通，在唐代交通位置突显，陆路上与阆中（唐之阆州）、三台（唐之梓州，曾是唐东川节度治所）、成都（唐之益州，西川节度治所）在一条线上，是京城联系兴元和东、西川的重要通道，同时从巴中顺江而下可达重庆，进入长江，北上还可分道入河西，交通便利。

^① 《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四川通志》嘉庆本，1984年巴蜀书社出版。

已深蔽谷株，谷深青又面北，长而深，南分古，要重其避避价虽交，坐卧微东。玄武兴时，因聘“玄武”而得名。山合米子，市中巴。山更重，归南重合水泉，一脉流长，源流正復育。脈流深，兴巴重地因重中巴，都玄律。中国巴土，都萌，是突厥叶跋交九首。所谓“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只有少数深广者稍可称“窟”，因沿袭旧俗，故许多时候仍称为“石窟”。巴中石窟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在四川石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经调查，巴中市境内现存石窟 59 处，500 余窟（龛），其中属隋唐

西刻记北，踞北承川因干巒市中巴。且望空凝巴干列四脚，三至秦。形神皆生，是故如斯。山川并日，原仰崇北南。山合米子，市中巴。山更重，归南重合水泉，一脉流长，源流正復育。脈流深，兴巴重地因重中巴，都玄律。中国巴土，都萌，是突厥叶跋交九首。所谓的佛教造像最多，共有 18 处，450 余窟（龛）。有分布于巴中市周围的南龛、北龛、西龛、东龛，水宁寺镇（唐之始宁县）的水宁寺、千佛崖，兴文镇的沙溪，三江乡的龙门村、佛爷湾，恩阳镇（唐之恩阳县）的千佛崖、佛尔岩，化成镇（唐化城县治今巴中城）的石门



图二 巴中市石窟分布示意图

寺，麻石乡的佛尔岩，三汇乡的奥基寺，来龙乡的佛爷湾，玉井乡的佛尔岩，曾口镇（唐之曾口县）的佛洞湾，甘泉乡的佛框湾、佛尔岩等。这些窟（龛）像，绝大多数为唐代作品，少数开凿于隋代。窟龛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数佛道合龛造像和明清至民国时期儒教、道教和民俗造像。唐代龛像最集中、保存较好的有城周的南龛、北龛、西龛，水宁寺镇的水宁寺，化成镇的石门寺，兴文镇的沙溪和三江乡的龙门村等。其中南龛、北龛、西龛、水宁寺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沙溪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二）。

南龛石窟位于巴中市城南五公里的南龛山上，为巴中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者。据2000年调查，现存有编号的龛窟176个，绝大多数集中分布于南龛山神仙坡东面崖壁上，不仅内容丰富，造型精美，其完好程度更令人惊叹不已。内容有释迦佛、三世佛、弥勒佛、菩提瑞像、千佛、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阿弥陀佛与观音和地藏、双头瑞佛、如意轮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毗沙门天王、观音菩萨、观音与地藏菩萨、鬼子母以及经幢和墓塔等。毗沙门天王和反映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龛像在这里尤其突出，保存完整，是唐代四川非常流行的题材。南龛现存龛像主要集中分布在山崖东面的北段，始创于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亦多有开凿。现存唐代的纪年铭文中有开元、乾元、咸通、

会昌、中和等年号。山崖的南段主要是墓塔。从唐以降，南来北往的达官显贵和商人们多有驻足南龛，造像装彩，也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优美的篇章。著名的唐代“严武奏表碑”即刻于山前云屏石上，为历代金石书籍所载，^①严武为其父所造尊像及造像铭记亦清晰完整。南龛山上唐宋以降的诗词题记到底有多少至今无人全面统计过，其中最多的是宋元题刻游记和清代墨书装彩记。它们不仅反映了来此礼佛、参佛的各色人物，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佛教信仰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更为我们提供了前述“米仓道”繁荣昌盛的佐证。

西龛石窟位于县城以西约1公里的凤谷山西龛村，现存造像90余龛，分布在龙日寺、流杯池、佛爷湾三处，是巴中现存石窟中开凿最早、雕刻最好、内容最丰富的一处。佛爷湾位于山脚下，又称西龛寺，现存龛像集中分布于南北向的一崖面上，共50余龛。内容有释迦佛、弥勒佛、菩提瑞像、七佛、释迦多宝并坐、释迦弥勒并坐、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观音菩萨、释迦老君并坐及墓塔和残碑刻等。绝大部分像龛开凿于盛唐，其中10号龛侧有开元三年（715）的造像记。距离10号龛不远的21号龛侧有五代时题刻的“捡得大隋大业五年（609）造前件古像”题记。21号龛内雕释迦说法像，释迦两侧的天王和力士特别引人注目。力士项饰璎珞，下着长裙，身躯修长，衣着和装饰有别于巴中他处

^①现存之“严武奏表碑”可能为明末清初翻刻，参看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